

中文版總序

《清錢編年譜》中文版終於付梓。看到這部裝幀典雅、印刷精美、內容滿滿的著作，我感到由衷的高興，因為我終於可以向我的丈夫布威納交差了。

布威納是我最敬佩的人。我很喜歡稱呼他為“老布”。老布在讀小學的時候，有一次去參觀了博物館。當看到中國的青銅器和國畫的那一瞬間，他的心就像觸電一般，立刻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時，一個強烈的願望就在他心裏萌生了：學中國文化，娶中國太太。此後餘生，老布都在為實現這個願望而努力。

我和老布相識於1975年，在此後近半個世紀裏，我們同甘共苦，相伴相隨。那年他獲得了德國慕尼黑大學博士學位，成為世界上第一位中國錢幣學博士。他實現了“學中國文化，娶中國太太”這個兒時的夢想。但這個博士學位來之不易，他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老布在準備博士論文時，打算把中國清代錢幣作為研究方向。他的導師，慕尼黑大學漢學家傅海博教授（Prof Dr Herbert Franke）曾勸他改變研究方向，因為那個年代在德國查閱清代錢幣及其相關的歷史文獻極其困難。但是，老布還是固執地堅持下來了，最終憑着他的決心及毅力獲得了博士學位。傅海博教授認為老布的博士論文是最有突破性的清錢研究，所以鼓勵他將這篇博士論文出版發表。這也就是老布的第一本專著《清錢編年譜：至雍正末年》，1976年在中國臺灣出版發行。

由於資料匱乏，他博士論文研究的清代錢幣止於雍正末年，即1735年。但他下定決心，要繼續完成關於整個清代錢幣體系的研究，也期盼我能協助他共同完成這個宏願。這個邀請對我來說簡直是無上的榮耀，我當時就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一晃二十年過去了。1996年的一天，我望着他問：“你的書何時能出版呢？”他睜大雙眼盯着我，非常不高興地說：“我不是為了出版才寫書的。一個負責任的學者應該追求在學術上有所貢獻。”那一刻我因自己的淺見而自慚形穢，自此不敢再問類似的問題了。十七年後，也就是2013年5月的一天，他悄悄地在我耳邊說：“親愛的，我想我可以出書了，我心中的大部分疑問應該都找到了答案。”

於是，老布的第二部著作——《清錢編年譜》，在2016年由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出版了。這部書凝聚了老布五十年的研究成果和心血，是他用畢生精力打造的一個中國錢幣學窗口。他深耕學術長達半個世紀，出了兩部巨著，却說

他自己只窺探到中國錢幣學的冰山一角。我曾多次問他為何選擇如此冷門孤僻的錢幣學作為畢生的研究方向，他總是調皮地回答我：你們爺爺的錢都沒有一個權威的研究，那就讓我這個高鼻梁的來填補吧！

我希望老布的著作能夠引起海內外漢學家和錢幣學家的重視，讓熱愛老布的讀者們能走進他的精神世界，分享他的愉悅。《清錢編年譜》出版後，老布和我開始商討此書的中文版事宜，但因為他的健康狀況，具體工作一直未能實施。老布於2021年11月15日去世。2022年2月，我隨即着手策劃這部巨著的中文版翻譯工作，並開始尋找合適的翻譯人員。翻譯工作嚴格遵循“信”“雅”“達”這三大標準，並按照三譯三校的原則組建了三個翻譯團隊：一是古泉文庫叢書負責人宋捷先生領導的西安團隊，二是香港化美設計顧問有限公司陳鳳如女士及她的公司團隊，還有我和老布的老朋友葉奕斌先生和鄭少雲先生，三是德國的陳海蓮博士。這三個翻譯團隊以忠實老布的英文原著為基本要求，進行翻譯、校對和再校對，然後由錢幣學專業的佟昱博士校對錢幣學專業術語的翻譯和使用情況，最後再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董敏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學的方稱宇教授進行全面的譯審工作。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還根據老布和新疆錢幣博物館蔡傑華先生的信件往來，對英文版的一些表述在譯文中做出二三處相應修改和調整。翻譯工作於2024年3月結束。這整整二年間，中文版的翻譯工作受到全世界各地錢幣專家、漢學家和錢幣愛好者的關注和支持，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館前任幣章部主任克力勃博士和中國錢幣博物館館長、中國錢幣學會秘書長周衛榮先生以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吳元豐教授的關注和支持。沒有他們的鼎力支持和鼓勵，這部中文版是無法完成的。在此，我向所有參與、關注和支持此書翻譯工作的學者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清錢編年譜》中文版既是我對老布的紀念和緬懷，也是我對全世界中國錢幣愛好者和研究者的致意。我希望這部書能夠成為中國錢幣學的一個新的起點，讓大家以老布的研究為基礎，將博大精深的中國錢幣文化弘揚光大。

布太蔡逸美
中華文教促進會創始人

推進中國清錢研究 走向新的高度

我和布威納先生真正意義上的見面只有一次，那是2004年6月1日，他和夫人突然來訪中國錢幣博物館。因為我早就拜讀過他的第一著作——《清錢編年譜：至雍正末年》，所以神交已久，這次會面，喜出望外，相談甚歡。我請他來我館做一次學術報告，他欣然答應。3日下午他如約來館，報告的題目是《我的清代貨幣研究歷程與成就》，後來正式發表在《中國錢幣》上。

他是德國的漢學家，研究重點非常明確，就是清代錢幣。真有點像日本的小川浩先生，一生注重宋錢研究，最後成書《新訂北宋符合泉志》，成為日本人的驕傲。作為一名德國學者，一生傾注於中國清代錢幣的研究，比日本人研究中國古錢要難得多。文字語言的隔閡，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除了要面對浩瀚的實物，面對每一個文字的區別、版式的區別，還要面對相關的文獻資料、檔案資料。只有掌握了第一手資料，才能正確地區別不同版式之間的關係。布威納先生以畢生的精力完成了他的誓言，完成了他的《清錢編年譜》，為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財富。

今天，《清錢編年譜》中文版要正式出版，這不僅是對布威納先生應有的匯報，更是中國錢幣界的福音，是清錢研究界的福音。它的出版，一定會推進中國的清錢研究走向新的高度。

戴志强

中國錢幣博物館首任館長

研究員

布威納博士與他的著作《清錢編年譜》

布威納 (Werner Burger) 先生是德國慕尼黑，是第一位以研究中國錢幣獲得博士學位的西方學者。他畢生致力於中國清朝貨幣研究，是清朝錢幣年代、版別鑒定方面的權威專家。

1936年，布威納出生於德國慕尼黑，還在中學時期就對中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考入慕尼黑大學後，布威納選擇主修漢學。1962年大學畢業後，他幾經周折來到中國講授德語，1965年後定居香港，遂對清朝歷史產生興趣，漸漸轉向清朝錢幣研究，並於1975年獲得慕尼黑大學博士學位。他歷經四十餘年完成巨著*Ch'ing Cash*《清錢編年譜》(英文版)，2016年由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出版。這是一部集學術性、資料性和工具性於一體的傑作。

研究清代錢幣，首先要有實物樣本。感動於布威納先生研究中國清代錢幣熾熱的激情，一位香港商人特許布威納先生，以他從印度尼西亞進口回來的廢銅料中的中國古錢幣為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的研究。這批廢銅料中的中國古錢幣有七噸重，總數約兩百萬枚，布威納先生從中挑選出十萬枚清錢作研究樣本。歷史上印度尼西亞從宋代就開始使用中國錢幣，直至20世紀40年代。這批錢幣為布威納先生提供了廣泛、充裕而可靠的研究樣本。因此，這部書擁有豐厚的錢幣實物基礎。

研究清代錢幣，要查閱大量歷史文獻，這對一位德國人來說是比較困難的。為此，布威納先生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去收集他所能了解到的有關清代錢幣、貨幣制度、錢幣鑄造以及錢局的文獻資料。他不僅詳細翻閱了《清朝文獻通考》《清實錄》《雍正硃批諭旨》等正式出版過的文獻，還查閱了大量尚未出版的清代漢文內閣戶部題本、宮中硃批奏摺、軍機處錄副奏摺等。為了搞清楚清朝各個皇帝的具體文獻檔案的遺存、分布與收藏情況，他曾幾十次專程從香港赴北京及臺北查閱清宮檔案，並先後請教了多位清史專家、學者，如

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戴逸教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唐益年先生、吳元豐先生等。特別難能可貴的是，為了補充有關新疆、西藏鑄錢的文獻檔案，布威納先生在唐益年、吳元豐等同志的幫助下，克服種種困難，下力氣查閱了大量的滿文文獻，終於理清楚了清朝新疆、西藏兩地的錢幣鑄造情況。

這部書充分展現了一位德國學者嚴謹、深入、細緻的研究精神。布威納先生在消化吸收了大量文獻檔案的基礎上，下大力氣開創性地對清朝各代的錢幣做出了具體的分類分式研究，並在此過程中積累了區分贗品與私鑄錢的經驗，掌握了清朝錢幣的鑒定辨偽方法。為了排出各個皇帝統治時期各地錢局所鑄錢幣具體的年代次序，布威納和他太太蔡逸美女士用了十六年時間來尋找有關錢局鑄錢的資料信息。在對來自印度尼西亞的清朝錢幣做完詳細研究之後，布威納發現其中缺少咸豐朝錢幣及新疆和西藏地區的錢幣，於是他和太太從不富裕的家庭財資中拿出不小的一筆經費去購置補齊。古人曰：“十年磨一劍”，《清錢編年譜》這部書被布威納“磨”了四十餘年。可見，這部書不僅展現了一位學者嚴謹、執着的學術追求，也展現了一個家庭對學術與中華文化的奉獻精神。

布威納先生離我們遠去了，但他的著作是不朽的，他對中國錢幣學的貢獻將永遠讓人銘記。

周衛榮

中國錢幣博物館館長

中國錢幣學會秘書長

布威納與《清錢編年譜》

在我任職大英博物館的早期，很榮幸地認識了布威納先生，并拜讀了他的《清錢編年譜：至雍正末年》¹，二者均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布威納先生以他慣有的熱情和機智問候我。在遇到他之前，我正致力於整理大英博物館的中國硬幣收藏。最近一次對這些藏品進行嚴謹研究是19世紀90年代，當時的研究者是泰里安·德·拉科佩里（Terrien de Lacouperie）。這位法國漢學家當時在倫敦工作，19世紀80年代大英博物館曾請他來協助擴充并整理中國錢幣的藏品²。儘管大英博物館幣章部（Department of Coins and Medals）屢次提議，但最終也未能向他提供一份長期固定的工作。1970年我接受博物館的任命，這為重新評估這一批八十年來被疏於管理的藏品提供了第一次機會。我最早接觸中國錢幣是受我的兄長史蒂夫（Steve Cribb, 1944—1993）影響，他酷愛收集中國錢幣與紙幣。

因此，結識布威納先生對我而言是一件真正難得的樂事。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另一位積極研究中國錢幣的學者，并且立刻意識到他要實現的目標。同所有優秀的錢幣學學者一樣，他的首要任務是要對中國錢幣進行細緻入微的研究。布威納先生幸運地接觸到大量清代錢幣實物，通過對這些錢幣的研究，他發展了按年號、錢局進行分類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能通過錢幣的銘文、尺寸和外緣寬度等細微版式變化，對這些錢幣進行分類。當他能夠將當時的錢幣生產記錄檔案結合到這項研究中去時，他就可以按時間順序排列錢幣，并對錢幣鑄造情況進行詳細的說明。當我見到他時，他已完成對清代早期錢幣（至1735年）的研究并發表了相關成果。在他之前，從未有人進行過這樣的研究。正如布威納本人在書中所言，“花了無數的時間按年份整理每個錢局的錢幣”，培養了他自身的洞察力，從而使他能夠充分地依據歷史檔案來排列錢幣的發行順序，并將他的研究時期擴展到清朝末年。他說：“按年份排列後，我就能夠理解了……”³ 我從他那裏學到了許多東西。

儘管中國錢幣的收集和記錄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古錢幣鑒賞家們也樂於收集、記錄錢幣文字上的細微差別，但布威納是第一個運用這些技能去全面了解一個朝代錢局鑄幣發行過程，并用它們來解決貨幣體系問題的人。他將錢幣中獲得的數據與當時的檔案記錄相結合，編制了各省歷年的錢幣發行和鑄造水平的完整記錄。通過這種方式，他能夠展示國內外戰爭對貨幣供應的影響，評估清政府與各省在應對貨幣供應問題上的政策，以及為遏制私鑄貨幣所採取的措施。他的分析還揭示了道光（1821—1850）和咸豐（1851—1861）時，清政府首次引入銀幣的嘗試⁴，以及在太平天國運動（1850—1864）時鑄造的各類代幣⁵。布威納先生收藏和研究的廣度也使得他能夠對官方重新引入紙幣及其在19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與所造成的混亂進行歷史背景的分析⁶。他在對光緒時期

（1875—1908）鑄幣的描述中，仔細交代了最終無“果”而終的中國機製幣生產嘗試。這是展示傳統鑄幣與西方鑄幣技術到來之間關係的一個重要故事，這在其他研究領域都有着共鳴。

布威納先生對知識的渴求和他的人文精神在這本優秀的著作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確實是一項終身成就。通過積累這些證據，他創造了關於清代錢幣及其生產的詳盡知識。他對這些數據的嚴謹分析充滿了謙虛的態度，這增強了其貢獻的價值。當證據不足時，他欣然承認，并寫道：“當然，這涉及人為猜測，并不是個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⁷ 他的誠實為後續研究獲得更完整的結論提供了契機。他對材料了解如此透徹，以至於必要時能夠認識到其中的不足。這是真正學術研究的標誌。布威納的著作也體現出他早期接受的學術訓練，還有與其他學者的密切交流，尤其是他參與的由德國圖賓根大學漢學系教授傅漢思（Hans Ulrich Vogel）主持的“中國及東亞地區的貨幣、市場和財政（1600—1900）”的研究項目。

布威納的研究著作及其影響力在可預見的未來會持續存在，因為他的收藏時機恰到好處，因此他不僅能夠收集到數量如此巨大的錢幣，還能將這些錢幣進行詳細的記錄。未來無疑還會有更多的清代錢幣出現，但它們也只是布威納這部不朽作品的附加點綴而已。他的著作所產生的影響在過去十年的錢幣學研究中顯而易見。最近的研究，包括佟昱的順治錢研究、張偉的康熙錢研究、汪洋的寶蘇錢局研究、陳文軍的浙江錢局研究⁸ 都表明布威納的成果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為新的研究與分析提供資料源泉，不僅是在中國錢幣學領域，而且在有關清朝的行政、經濟等歷史研究中也是如此。

這部中文版及其英文原版將保留布威納先生的成就與聲譽。數十年來，他傾注心血收藏了大量錢幣、檔案史料與書籍文獻。他留給我們的不僅是這部宏偉而複雜的著作，還有他為寫作此書所收集的“證據”，即各類資源。他的錢幣收藏、圖書館資源會與此書一起成為清朝貨幣史的見證。我希望當它們找到一個永久的落地地“家”時，它們能繼續激勵與啓迪未來的學者，以推動布威納的研究成果不斷向前發展。未來這些學者的工作也將見證布威納的成就和他對知識的貢獻。

喬·克力勃博士

河北師範大學錢幣學客座教授

前大英博物館幣章部管理員

東方錢幣學會副秘書長

¹ Werner Burger, *Ch'ing Cash until 1735*, Taipei, 1976.

² Albert É. J-B. Terrien de Lacouperie, *Catalogue of Chinese coins from the VIIth cent. B.C., to A.D. 621. including the seri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892.

³ Werner Burger, *Ch'ing Cash*, Hong Kong, 2016, p.9.

⁴ Werner Burger, *Ch'ing Cash*, Hong Kong, 2016, pp.107–108, 131.

⁵ Werner Burger, *Ch'ing Cash*, Hong Kong, 2016, pp.117–136.

⁶ Werner Burger, *Ch'ing Cash*, Hong Kong, 2016, pp.137–144.

⁷ Werner Burger, *Ch'ing Cash*, Hong Kong, 2016, p.163.

⁸ 佟昱，《新編順治通寶錢譜》，北京，2016年。張偉，《康熙錢幣圖譜通考》，濟南，2014年。汪洋，《寶蘇泉匯》，上海，2015年。陳文軍，《寶浙清錢譜》，杭州，2020年。

追憶布威納先生

布威納先生是一位集鑒賞與研究於一身的著名清代錢幣收藏家、鑒定家、學問家。1936年他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州，後來他在慕尼黑大學研習漢學，進而對清代錢幣產生興趣，開始專門研究中國錢幣史，撰寫題為《清錢編年譜：至雍正末年》的博士論文，是世界上第一位榮獲中國錢幣學博士學位的人。因情繫中華文化，他從遙遠的西方來到東方，完全融入東方的人文環境。他曾在上海復旦大學教過德語，後到香港成家定居，在其夫人蔡逸美女士默默無聞的支持下，畢生熱心於中國古錢幣的收藏，潛心於清代錢幣歷史的研究，取得舉世矚目的驕人成果。2021年11月15日，布威納先生在香港謝世，走完了他那傳奇的人生歷程，享年八十五歲。

二十多年前，經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編目部主任唐益年先生介紹，我有幸與布威納先生和其夫人相識。初次見面的情景，迄今仍記憶猶新，夫婦二人彬彬有禮，為人謙和，待人熱情，給人感覺閱歷非常豐富。先生說話低沉緩慢，夫人說話柔和中速，在交談中“夫唱婦隨”，相互配合得十分到位，足見其伉儷之間既是幸福的生活伴侶，又是快樂的工作夥伴。通過交談，我發現他們想瞭解明清檔案中所存錢幣資料的欲望強烈而迫切，特別是滿文檔案中的情況。經過報請批准後，我從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和月摺檔中，共查出有關錢幣的檔案六十一件，譯出漢字，然後將漢譯文移交給布威納先生。

我們之間的交往就此開始，交情越來越深，一直保持到現在。他們每次到北京後，都要約唐益年先生和我見面小聚，叙叙舊情，談談學術。有一次，我主動提出：“北京有個錢幣博物館，離故宮不遠，就在天安門西南的西交民巷，還沒有正式對外開放，現正在內部預展。我有一位好友，可以通過他去看看。”布先生說：“我沒有去過，可以去參觀一下。”我的那位好友，是我的伊犁老鄉，也是一位著名的錢幣專家，時任中國錢幣學會副秘書長王永生先生。我跟對方約好後，就陪同布先生及其夫人到中國錢幣博物館參觀，同時與博物館和學會的專業人員進行了座談交流。就這樣，布先生就與中國錢幣學會建立起了聯繫。2005年，他在該學會會刊《中國錢幣》上發表了《布威納：我的清代貨幣研究歷程與成就》。2021年11月18日，即布先生去世後的第三天，在中國錢幣博物館官網微博上，經加按語和人物圖片後，重新刊發此文，以此緬懷。

記得有一年秋季，我和唐先生兩家人去布先生和其夫人在北京“798”藝術區家裏小聚。席間，夫人談到布先生有兩大愛好：一為收藏清代錢幣，二為收藏書。他每到一處都探聽信息，凡遇到稀缺的幣種都要設法購置收藏。在布先生長期不懈的努力下，收齊了有清一代鑄造過的各種錢幣。他以全面系統研究清代錢幣為目的，長期堅持收集有關圖書資料，除圖書之外，僅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集到的檔案數量就十分可觀，共二千八百多份，經打印成冊的紙質文本約六十冊，四萬三千餘頁。布先生還從準備作為廢金屬處理的七噸約二百萬枚古錢中，親自鑒別選取有價值的十萬餘枚，作為自己的收藏和研究之用。布先生的此舉，不僅為其收藏和研究奠定了基礎，而且更重要的是搶救了一批寶貴的中國古錢幣，這必將惠及後人和相關學術研究，可謂功德無量。我由衷敬佩，感受到了布威納先生的執着、勤奮、敬業、嚴謹的治學態度，以及對學術目標的不懈追求和努力踐行。布威納先生的漢學知識淵博，潛心研究中國的古錢幣，練就了扎實的鑒別能力，具備了超凡的精神境界，從而成為非同尋常的錢幣收藏家。晚宴結束道別時，我冒昧地問布威納先生：“今後在學術方面有何打算？”他爽快地回答：“要編寫《清錢編年譜》一書，這是我的終極研究目標，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圓滿完成。”

功到自然成。《清錢編年譜》是一部兼備學術性、資料性和工具性的傑作，具有填補清代錢幣學領域空白的地位和價值，同時因用英文撰寫并兼以漢文和滿文標注名詞術語，無疑對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國錢幣文化傳播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清錢編年譜》原版是用英文撰寫的，在中國香港印刷發行，在中國內地能夠閱覽到的讀者極其有限，其應有的價值和作用，必然受到一定的影響。所以，布威納先生和其夫人一直希望出版中文版。經過多方努力，特別是在布太蔡逸美女士的不懈努力和積極爭取下，翻譯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本爭取在布威納先生健在時出版發行，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還是給人們留下了一些遺憾。

二十餘年的交往，實在無法忘懷，不揣冒昧，特撰此文，以表緬懷。

吳元豐教授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

布威納博士清代錢幣研究的 學術價值與意義

布威納博士是中國錢幣學，特別是中國清代錢幣學領域的巨人。他的錢幣學研究方法基於實證，通過對海量錢幣的反複排比，歸納出它們鑄製和行用的內在規律，為中國清代鑄幣史料提供了成體系的、全面的印證和修訂。他的巨著《清錢編年譜》於2016年在香港出版。書名雖然樸素平白，但篇幅磅礴，內容宏大，涵蓋了整個清代將近三百年的錢幣史，列舉方孔鑄幣六千種，並將其一一按鑄局和鑄製年代歸類編排，可謂中國清代錢幣之大系。這一創舉由他和太太蔡逸美女士二人協力完成，尤其值得我們敬佩。

我和布老雖素未謀面，但熟知他的研究和著述。1995年，我和大英博物館幣章部主任喬·克力勃教授 (Joe Cribb) 第一次見面，就興致勃勃地討論基於錢幣庫的錢幣研究方法。我也曾有幸在美國徵集到一冊《故宮清錢譜》，上有布老簽名，題贈給美國錢幣學家維吉爾·漢考克 (Virgil Hancock)。英國著名錢幣收藏家托尼·莫森 (Tony Merson, 1950—2016) 是我的摯友。某年冬月的一天，他來我寓所聚會時，不僅照例帶來一大盒他的新藏，還贈送我一冊原版《清錢編年譜：至雍正末年》。該書為布老的第一部清錢著作，1976年由臺北美亞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那晚我們邊探討彼此收藏的錢幣，邊翻閱布老的著作，不覺已至次日凌晨兩點。

2005年，我自倫敦大學學院加盟香港城市大學。執教之餘，我繼續多年的錢幣研究，尤其是有關中國花錢的研究。2008年，我完成了《中國花錢與傳統文化》一書，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十五年後的2023年，當我第一次走進布老的書房時，我驚喜地在他的書架上發現了自己的這本拙作。的確，布老有着淵博的錢幣文獻知識，他的學術建樹不僅基於他對海量錢幣實物的擁有（他過手錢幣約二百萬枚，收藏錢幣逾十萬枚），而且基於他對海內外各種錢幣

學著作的把握，更基於他孜孜不倦的學術研究和一絲不苟的學術精神。在他的書房裏，我有幸看到他一生收藏的錢幣實物、各類歷史檔案和圖書資料，還有大量的手稿和讀書筆記。布老雖已逝去，但他書房裏的一切都在向我述說一位德國漢學家、檔案學家、錢幣學家、圖書收藏家的學術歷程和研究心得。

除清代鑄幣外，布老收藏有為數眾多的清代銅圓、銀幣、銀錠、紙幣以及清代之前的各朝錢幣，包括歷代花錢。受布老的囑托，我整理了布老近千枚的花錢藏品，並撰寫了《布威納博士的花錢收藏及文化意義》一文，對其加以描述和分析。這部分收藏已詳細收錄於我編錄的《著名清錢學者/收藏家布威納博士舊藏——第三部分：中國花錢》，2023年由英國斯賓克 (Spink) 公司印刷出版。實物於同年4月13日拍賣，屢創花錢拍賣紀錄。在布老的認知裏，花錢是歷史、宗教和民俗的載體，和行用錢一樣，是中國錢幣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清錢編年譜》中收錄了不少他收藏的清代官鑄花錢，如康熙聖壽錢、光緒奉先殿包袱錢、江寧局開爐試鑄錢等，皆為稀世珍品。毫無疑問，布老對中國錢幣的研究已遠遠超越了錢幣學的範疇，深刻地觸及歷史、宗教、經濟和社會等多個領域。

現在，《清錢編年譜》的中文版在布太夜以繼日的籌劃下與讀者見面了，這是中國錢幣學界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必將對目前和將來的清代錢幣學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布老和布太功德大焉！

方稱宇教授 PhD, FRSA
香港城市大學韓禮德語言研究智能應用中心主任

用錢幣版式叙寫的歷史—— 布威納博士與他的《清錢編年譜》

錢幣既是反映社會經濟、政治面貌的一面鏡子，也是濃縮一個國家文化特徵的名片。清代錢幣是中國傳統鑄幣體系發展到終極階段，并向近代化過渡的產物，它凝聚了三千年民族智慧的精華，也銘刻了東西方文化碰撞的記憶，在貨幣史上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依模複製是金屬鑄幣的一個共有特徵。在錢幣鑄造過程中，古人希望通過錢幣外觀來傳遞信息，例如：國家的法統與制度、鑄幣標準、文化理念、藝術審美等，都是通過最初的錢模設計，使其具象化之後，再經翻模、澆鑄，最終才得以呈現的。所謂“版式”正是體現於錢幣兩面的錢模設計樣式，是批量鑄行錢幣所執行的外觀標準，它會隨着鑄幣制度、鑄地與鑄期的變化而變化。版式研究的實質正是應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根據版別之間的親疏關係，通過對大量錢幣實物的聚類歸納來復原錢模設計及選用的過程。以此為鑒，將有助於我們追溯古代鑄幣的詳細過程及演變規律，填補文獻記載的空缺，為深入探索錢幣背後所蘊含的社會經濟及制度因素提供重要佐證。布威納博士的《清錢編年譜》正是這樣一部錢幣版式研究的典範，它集學術性、資料性、工具性於一身，是有史以來對整個清代鑄幣體系進行系統性研究的首個成果。

布威納博士雖為德國人，但自幼痴迷中華文化，在慕尼黑大學主修漢學時就立下了到中國去“研究中國的歷史，娶一位中國妻子”的志向。20世紀60年代，懷揣理想的他幾經輾轉來到中國并定居香港，機緣巧合之下，開啓了他專研清朝錢幣的學術人生。也許是上天的眷顧，又或是自己的堅持和努力，1975年，布威納先生以一篇具有開創性貢獻的畢業論文——《清錢編年譜：至雍正末年》(*Ch'ing Cash until 1735*)獲得了世界上首個中國錢幣學博士學位，不久後又與默默支持他一生的蔡逸美女士喜結連理，實現了他年少時的夙願。但布威納博士并未止步於此，他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投入後續對整個清朝古錢的研究工作中。在歷經四十二年的不懈努力之後，布威納博士最終完成了一部劃時代的巨著——《清錢編年譜》(*Ch'ing Cash*)，並於2016年由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出版。作為清代錢幣研究的里程碑式的傑作，布威納博士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布威納博士融合了東西方錢幣學的精髓，立足於清朝錢幣的自身特點，開創了“按年分版，逐年研究”的錢幣學新範式，將碎片化的清朝錢幣，按照時空序列有機地構建成為一個連續的整體。此舉的意義在於，將宏觀視角下的古代社會經濟矛盾、貨幣制度的變遷與微觀層面上錢幣實

物的歷時性變化有機地聯繫了起來，在直觀再現清代錢幣演變歷史，構建貨幣史與錢幣學研究之間橋梁的同時，也為“錢幣版式”這一概念賦予了更為豐富的科學內涵。

其二，無論是研究方法的有效性，還是結論的正確性都離不開充分的證據支撐，而聚焦實證的嚴謹作風正是布威納博士的成功要素之一。在六十多年漫長的研究生涯中，他憑藉一己之力，系統地收集整理了從天命到宣統年間，來自全國一百多個錢局的各類主要鑄幣。這些珍貴藏品不僅包括來自印度尼西亞出土的七噸（約二百萬枚）錢幣窖藏中揀選出的十萬餘枚清代制錢，還有遊歷各地及從各大拍賣行所獲的珍稀錢範、各類祖錢、母錢、樣錢、宮錢、試鑄錢等珍稀品種，從而構建起了目前世界上體量最大、品類最為完備的清代錢幣標本庫，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實物基礎和證據。

其三，在文獻的收集整理方面，“嗜書如命”的布威納博士不僅收藏了超過四千冊相關古籍善本及中外研究文獻，更有來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館藏未刊檔案，其中包括：六千八百餘條關於制錢鼓鑄的《內閣題本》《戶科奏摺》《硃批諭旨》《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等，彙集成六十冊，多達四萬三千餘頁。這些珍貴一手資料的內容涵蓋從康熙五十四年到宣統二年，中央及各地錢局鑄行錢幣真實過程、鑄造數量、鑄造成本與利潤，以及錢幣鑄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與應對策略等。這樣一座獨一無二的清朝錢幣文獻資料庫，不僅為布威納博士的版式分類與編排提供了準確的時空坐標，也為解釋版式變化背後的歷史原因，以及統計歷朝鑄幣數量提供了重要參考。

總之，布威納博士的《清錢編年譜》是清代貨幣史與錢幣學領域的一部全景式學術著作，它集大成，啓博思，在實物集藏和理論研究方面所開啓的廣闊空間是可以預見的。布威納博士雖然已經離開了我們，但這部著作必將與他六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專研精神一道為歷史所銘記。如今，《清錢編年譜》中文版付梓在即，作為後來者的我，在表達緬懷之餘，也以自己能與一群志同道合者一起，為該書的翻譯審定盡到綿薄之力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佟昱
中國錢幣學博士